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汉语与外语

HANYU YU WAIYU

季羨林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百种语文小丛书

HANYU YU WAIYU
汉语与外语

季羨林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百种语文小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曹先擢

副主编 苏培成 高文元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	董 琨	高文元	顾士熙	侯精一
季恒铨	江蓝生	李建国	李守业	隆 林
吕宏伟	孟吉平	南保顺	宋绍年	苏培成
佟乐泉	王 宁	熊正辉	于根元	赵 曾

总 说 明

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普及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迫切。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可须臾缺少的基本手段,在信息时代其发挥的作用更为巨大。语言文字知识既有传统的,也有新的。语言文字知识的普及工作有待加强。我们编辑这套《百种语文小丛书》,正是想在这方面尽绵薄之力。小丛书的篇幅较小,只有几万字。我们力求少而精,以便于读者购买和阅读。

语言文字知识的内容十分广泛,你如果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分类目录,便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这套小丛书,不是对语言文字知识作全面系统的介绍,而是偏重于人们在学习、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语言文字知识。

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水平,取决于作者对相关知识了解和掌握的程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是高质量的。因此,在约稿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是,谁对某方面问题有研究,就请谁撰写某方面的书

稿。作者素有研究,自然能够驾轻就熟,保证所介绍的知识的科学性,而有的还具有知识的前沿性。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用普及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也是本丛书编纂目的之一。这只是个总的思路,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作者在写书时,要考虑整个丛书的编写原则,写什么,怎么写,从谋篇到动笔,是一个新的创作过程。本丛书是为普及语言文字知识服务的,然而书中有些内容事属专门;有的见解为作者一家之言,与社会通常的见解有的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对读者广见闻是有裨益的。小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语文工作者,其中有的是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正是由于得到了这些作者的大力支持,小丛书才能够顺利编辑出版,奉献给社会公众。

本丛书的出版,采取成熟一批出一批的方式,一时难以完全显示学科的系统性。我们打算在出版到一定数量后,再来分类配套,如语音的、语法的、词汇的、文字的,等等。敬希读者谅解。

《百种语文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当前的情况	(2)
三	我对出国留学的看法	(8)
四	语言,特别是外语的功能	(12)
五	翻译的危机	(15)
六	学习哪一种外语?	(19)
七	怎样学习外国语?	(24)
八	汉语学习问题	(32)
九	汉语的研究方法	(41)
十	结束语	(48)

一 问题的提出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世纪末中,也可以说是处在第一千纪的千纪末中,再过几年,一个新的世纪,21 世纪和一个新的千纪,第二千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值此世纪和千纪转轨之际,学术界的各门学科都在进行回顾与前瞻。我们语言学界当然也不会例外。在过去将近一百年中,我们学术界以及学术界以外一些人士,对待外语的态度有天翻地覆的转变。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世纪初的漠然懵然进到了世纪末的肃然狂然。时至今日,不但大中小学都有了英文教学,连给店铺起名,给商品命名,给新生婴儿起名字,都非带点洋味不行;连官方的电台也称之为 BT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这是进步呢,还是退化?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这里先不深入探讨。但是,我个人总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这是世界潮流所向,九斤老太头摇得再厉害,也无济于事。

但是,我们语言学界也不能特立独行,我们也不能反潮流,我们也必须在回顾与前瞻的基础上思考与语言有关的问题。问题是千头万绪,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先提出一个在我们日常活动中和学术研究中汉语与外语的关系问题,来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二 当前的情况

社会上一般的情况，我已在上面稍有所涉及，我在这里集中谈学术界的情况，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情况，后者是有些代表性的。

北大是处在社会中的，并非世外桃源。社会上弥漫着的外国热——简短截说，实际上就是英语热——当然会波及北大；不但波及，而且变本加厉。可是根据我多年的仔细的观察与体会，我终于发现，尽管在这里英语热热得发烫，但是，该学的人中却有不爱学者，而在学习的人中，学习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担忧。

什么叫“该学的人”呢？我首先指的是教师，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师，而是所有的教师。到了今天，大家都会承认，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学科，都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闭，闭关锁国。如果真想这样做的话，其无前途完全是可以断言的。就拿中国国学来说，表面上来看，这是中国的学问，中国学者不通外语，完全能够玩得转的。然而，如果不是井蛙观天而是放眼世界的话，则立刻就能发现，别的国家也在研究我们的“国学”，而且由于研究基础和传统的不同，由于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差异，往往能发我们所未发之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俯拾

即得，不承认是不行的。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个真理了，他们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外国汉学家往往喜欢搞一些很小很偏僻的题目，搞一些我们中国国学家所疏忽不注意的题目，搞一些由于语言条件的限制而我们搞不了的课题。这些题目完全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使我们的国学研究涵盖面更广，钻研得更深。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我们的国学研究，彰彰在人耳目，不言自明。至于国学以外的其他国际通行的学科，我们更需要随时了解世界各国同行们的研究情况，决不允许闭门造车，其道理更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解释反而会成为赘疣。

能做到这一步，必须通外语。

现在北大流行一种说法：我们的学科要与外国接轨。我认为这个说法提得好，提得鲜明生动，是不易之理，也是我们中国学术界进步的表现。但是，如果想接轨，必须首先知道，轨究竟在什么地方，否则自己的轨往哪里去接呢？乱接一气，驴唇对不上马嘴，接这样的轨有什么用处呢？

真想接轨，必须通外语。

事实上，有一些轨就在眼前，比如说到外国去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的基本上都是同行的学者，这些就是摆在眼前的轨，要想接立刻就能接上。然而，“眼前有轨接不得，只缘缺乏共同语。”我曾多次参加国外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时候我国派出

去规模相当大的代表团,参加者多为著名的学者,个个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在国内国际广有名声。如果请他用中国话作学术报告,必然是广征博引,妙语联珠,滔滔如悬河泻水,语惊四座。然而,我们的汉语,虽然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居众语的前列,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能争取到国际学术通用语的地位,一出国门,寸步难行。没有哪一个在国外召开的学术会议规定汉语为会上发表论文的通用语的。我们只好多带翻译。然而有不少会议规定,参加主席团不能带翻译,宣读学术论文不能带翻译。于是不会说洋话的代表团长(在国内往往是个官)只好退避三舍,成为后座议员。而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优秀论文也得不到向国外同行们显示的机会。

在会议休息时,往往到大客厅里去喝点咖啡或茶,吃点点心。这正是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交流感情,增强友谊的好时机。每一位学者手端一杯饮料,这里聊上几句,那里侃上一阵,胡谈乱侃中,往往包含着最新的学术消息。如果有共同的语言,这真是如鱼得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秀才不出厅,便知天下事。”然而,可惜的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只带了一张嘴,却没有带语言工具,除了点头微笑之外,连“今天天气,哈,哈,哈”都说不出来。尴尬之态可掬,只好找中国人扎堆儿谈话。

参加国外学术会议,必须通外语。

我在上面举的这几个必须学习外语的例子，只是顺手拈来，一点求全的意思也没有。真想求全，是办不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仅仅这三个小例子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我谈的对象也决不仅仅限于大学的圈子，这个圈子以外的所有的科研机构中的人员，都应当包括在里面的。至于在政府部门，不管是经济、教育、法治、国防，等等，等等，都必须同外国同行或非同行打交道。语言不能沟通，必须配备翻译，翻译必须学外语，而且还要学好外语，这属于常识之列，用不着多说了。

我现在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学习外语的必要性。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科研部门，研究学问第一步要懂目录学，特别是与自己研究的学科有关的目录学，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中国有造诣的学者，比如说乾嘉诸大师，以及西方各门学科有成就的学者，无不如此。不通目录学，不看新杂志，你连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都不会找到。研究学问，不能闭着眼睛捉麻雀。一个题目，特别在自然科学内，如果别的国家的学者已经研究过，而且已经得出了结果，你懵懂无知，又费上力量，从事研究。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将会腾笑士林，无颜见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情况与此稍有区别。比如一个庄子，别人能研究，你当然也能研究。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些题目不是钉是钉，铆是铆，同一个题目结果也能够而且

允许不同的。即使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者也必须了解国内外与自己研究有关的进展情况:与自己看法相同的可以增加研究信心;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可以供自己进一步推敲和思考。而且研究学问,不是创作写诗,你必须认真搜集资料,资料越多越好,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古代学者只搜集中国材料就足够了。我们处于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搜集资料只限于中国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放眼世界。这是时势使然,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而想做到这一步,必须学习外语。

根据我上面的极简短的说明,人们已经可以知道,在当前中国,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已昭如日月。我既讲了北大的教师,也讲到了北大以外的科学工作者。很可惜,在这些人中,不懂外语的和所懂不多的,人数并不算太少。更可惜的是,他们自我感觉极为良好,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似乎一点也不理会。我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尽快改变。

在“该学的人”之外,我还必须提到一类“学者”,我的意思是指“学的人”或者“爱学的人”。他们爱学外语,当然是一件绝大的好事。但是我又说到,他们学习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类人中,青年学生较多。他们学习得非常刻苦,除了上正课以外,有的还参加什么“英语强化班”,有的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们真懂得了学习外

语(首先是英语)的重要性了吗? 倘你进一步深入了解,可以说,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他们是懂得的。英语是一把金钥匙,可以帮他们打开出国的大门,可以帮他们拿到绿卡,可以使他们异化为非中国人。这是学习的目的,目的决定学习方式。指导他们学习的指挥棒就是大名鼎鼎的“托福”和 GRE。这两个指挥棒怎样指挥,他们就怎样跟着转,不肯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学外语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可以想见。抱着这样的目的,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外语,难道还不令人担忧吗?

三 我对出国留学的看法

读了上面我写的那一些话，也许有人会怀疑我是反对出国留学的。

不，不，绝对不是这样。我不但不反对中国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而且真诚地积极地希望和帮助他们这样做。不但年青学生，连并不年轻的教员，不管是哪一门学科的，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出国看一看，学一学，时间可长可短，走的国家可多可少，访问和学习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多少年来，世界各国的人士，都承认，现在的世界越变越小了。不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早已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连法显、玄奘、义净时代到天竺去取经要经过艰难跋涉，千辛万苦的情况，也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当今之世，出国千里万里，朝发夕至，人类连当年被认为是“天上宫阙”的月球都能够登上，要想再当井底之蛙，是绝无可能的。何况我们这一些在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学习和工作的人，更需要放眼世界，否则学习和工作都决无前途，因此我才有上面说到的那些想法和希望。

但是，我希望我们中国的老、中、青年的学者们，甚至包括一些学生在内都能够到国外去看一看，学一学，其目的同当前的人数不能算是太少的青年们

努力通过“托福”和 GRE 考试的目的是绝对不相同的,是针锋相对的。我希望,他们看一看,学一学之后还要回到我们的祖国来,用看到的和学到的本领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那些兀兀穷年,废寝忘食努力学习外语,通过必要的测试终于到了外国的青年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能拿到绿卡,放弃了中国国籍。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我是坚决反对和蔑视这种行为的。

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放弃一个国籍,取得一个新国籍,这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并不是犯法的行为。可是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必须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所谓“具体的分析”者,就是要看为什么,在什么时候,加入什么国家,放弃什么国家。这话太玄虚,还是直白地说为好。我不讲别的国家,只讲中国与美国。中国是一个穷国,而美国是一个富国,就眼前来说,这是最大的区别。嫌贫爱富,虽然说是人之常情,但是却一向为中国伦理道德所鄙视。西方国家的伦理道德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正常和正当的行为,别人无权说三道四。

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其中我谈到,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养成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

爱国主义，一个是讲骨气。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存在决定意识，这两个特点也是中国历史存在所决定的。中国从先秦起，每一个朝代都有“边患”，也就是外敌的侵略和骚扰。这些外敌今天可能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在当年却确是敌人，屠杀我人民，强占我土地。这种长达几千年的外敌压境的情况，就决定了中华传统的爱国主义。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等家喻户晓的爱国人物，没有外敌的国家是不会产生的。

至于讲骨气，则与此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外寇的斧钺前面，决不贪生怕死，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在别的地方，中国人也讲骨气：宁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几千年来在中国传为美谈。三国时候，祢衡击鼓骂曹；民国时候，章太炎赤足持扇胸佩大勋章站在新华门前痛骂袁世凯；解放前夕，朱自清忍饥不吃美援面粉，如此等等，都传为佳话，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硬骨头。

眼前，我们国家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由于众多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国，人们，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工资极低，同国外比较起来，简直让人感到寒碜和脸红。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现象，将来一定会改变的。我们眼前的日子确实过得非常紧，可并没有看到哪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挨饿的，而且按照中国古老的传统，越是在困难中越